

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的条件作用

杨磊¹ 钟婵婵² 李雪莲¹ 吴世韞¹ 申鲁军¹

1. 新乡医学院心理学院, 新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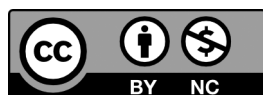
2. 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 杭州

摘要 | 目的: 探讨大学生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以及领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作用机制。方法: 随机选取 325 名大学生为被试, 使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人际信任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进行测量。结果: ①主观社会阶层能正向预测人际信任; ②领悟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③积极应对在主观社会阶层和领悟社会支持间起调节作用。结论: 领悟社会支持、积极应对等因素会影响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的关系。

关键词 | 主观社会阶层; 人际信任; 领悟社会支持; 积极应对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 在此过程中民众的人际信任不断下降。人际信任是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对同伴所持的积极期待, 其中包含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性^[1]。《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8)的研究显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 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不敢相信陌生人, 从行业和部门来看, 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2]。信任是人际交往的基础, 是个体与他人建立良好社会交往关系的基础^[3], 是团队合作的基本条件^[4], 如果缺乏基本信任会陷入焦虑不安, 对个体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5]。人际信任也影响着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 人际信任较高的个体很容易与他人相处, 可以得到同伴的尊重、同时他们也很少出现适应不良的现象^[6]。大学阶段是从校园开始步入社会的衔接点, 是信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7]。因此有必要关注大学生人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0-ZZJH-377); 河南省社科联项目(SKL-2021-1416)。

通讯作者: 申鲁军, 新乡医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认知, E-mail: shenlj945@163.com。

文章引用: 杨磊, 钟婵婵, 李雪莲, 等. 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领悟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的条件作用[J].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2, 4(1): 43-49.

<https://doi.org/10.35534/pc.0401006>

际信任的形成机制。

人际信任受多个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观社会阶层是影响因素之一。主观社会阶层是个体对自己拥有的物质资源和自己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的主观认知^[8]。虽然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不同阶层间的不信任程度进一步加深^[9]，但目前关于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方面，有研究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能预测人际信任，个体的社会阶层越高，信任程度也越高^[1, 10]，资源因素理论提出高阶层拥有更多的资源，在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上更有优势，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更能面对与陌生人交往所带来的风险^[1, 11]。另有研究得出相反结论，个体社会阶层越低，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12]；从认知与文化角度来看低阶层的信任水平更高^[11, 13]。还有研究发现二者的关系并不显著^[14, 15]。

由此可推论，在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之间可能存在其他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影响二者的关系。其中，领悟社会支持可能起中介作用。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期望和评价，是对自己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的信念^[16]。领悟社会支持是一种认知评价的过程，是一种认知现象。一方面，研究发现贫困生的客观支持显著低于非贫困生^[17]；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能正向预测社会支持水平^[18]。另一方面，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19]，社会支持能正向预测人际信任^[20]。个体获得来自学校、家长 and 同辈的关心、认可和支持越多，越能形成较好的品质信任和人际情感信任维系，增加其对所在环境以及交往对象的信任^[21]。综上，可预测领悟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之间起中介作用。

然而，主观社会阶层对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可能受到积极应对的调节。积极应对是个体面临压力时为减轻其负面影响而进行积极的认知与行为努力的过程^[22]。积极应对方式与主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呈显著正相关^[23]。然而，低阶层者拥有的资源较少，无论个体怎么积极应对，可能都难以获得较高的社会支持；而高阶层拥有较多的资源，积极应对可以帮助他们有效识别、利用各种资源和支持，提升领悟社会支持的水平。由此可预测，积极应对在主观社会阶层和领悟社会支持之间起调节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随机选取大学生 325 人进行施测，回收后有效问卷为 31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85%。其中男生 123 人，女生 195 人；平均年龄为 20.57 ± 0.90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主观社会阶层

采用 Adler 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阶梯共分为 10 级，从低到高分别代表个体在社会中所在的位置，等级越高，意味着社会地位越高，个体在阶梯中选择自己所处的位置^[24]。

2.2.2 人际信任

采用丁妩瑶修订的人际信任量表，共 10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法，包含社会现象信任和承诺行为信任两个维度^[25]。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47。

2.2.3 领悟社会支持

采用姜乾金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共 12 个条目，采用 7 点计分法，包含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人支持 3 个维度^[7]。为了贴合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将“领导、亲戚、同事”换成了“老师、亲戚、同学”。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1。

2.2.4 积极应对

采用解亚宁修订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中的积极应对分量表，共 12 个条目，采用 4 点计分法^[26]。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3。

3 结果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提取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9 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3.21%（低于 40%），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进行以下分析。

3.1 主观社会阶层与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Pearson 相关分析表明（表 1），主观社会阶层与领悟社会支持、人际信任、积极应对方式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符合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统计学要求。

表 1 各变量间相关分析

Table 1 Bivariate correlations between of all variables

	主观社会阶层	领悟社会支持	人际信任	积极应对方式
主观社会阶层	1			
领悟社会支持	0.239**	1		
人际信任	0.130*	0.156**	1	
积极应对方式	0.170**	0.595**	0.127*	1

注：*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3.2 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采用 process 插件中的 Model 7，以领悟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积极应对为调节变量，进行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的路径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方程 1 中，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显著（ $\beta = 0.130$ ， $p < 0.05$ ）。方程 2 中，主观社会阶层对领悟社会支持的影响显著（ $\beta = 0.1440$ ， $p < 0.001$ ）。方程 3 中，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beta = 0.098$ ， $p > 0.05$ ），领悟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有显著预测作用（ $\beta = 0.132$ ， $p < 0.05$ ）。说明领悟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方程 2 中，主观社会阶层与积极应对的乘积项对领悟社会支持的影响显著（ $\beta = -0.095$ ， $p < 0.05$ ），说明积极应对调节了主观社会阶层—领悟社会支持—人际信任这一中介模型的前半路径。

表 2 有调节中介模型检验

Table 2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方程 1 (人际信任)			方程 2 (领悟社会支持)			方程 3 (人际信任)		
	<i>B</i>	<i>SE</i>	<i>t</i>	<i>B</i>	<i>SE</i>	<i>t</i>	<i>B</i>	<i>SE</i>	<i>t</i>
主观社会阶层	0.130	0.056	2.325*	0.144	0.045	3.209**	0.098	0.057	1.719
领悟社会支持							0.132	0.057	2.319*
积极应对				0.558	0.045	12.324***			
主观社会阶层 × 积极应对				-0.095	0.041	-2.311*			
<i>R</i> ²		0.017			0.384			0.033	
<i>F</i>		5.403*			65.260***			5.427**	

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如图1所示,对于积极应对水平较低的大学生,主观社会阶层越高,越能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beta=0.240$, $p<0.001$);但积极应对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主观社会阶层对领悟社会支持不再有预测作用($\beta=0.049$, $p>0.05$),此时主观社会阶层不能通过领悟社会支持预测人际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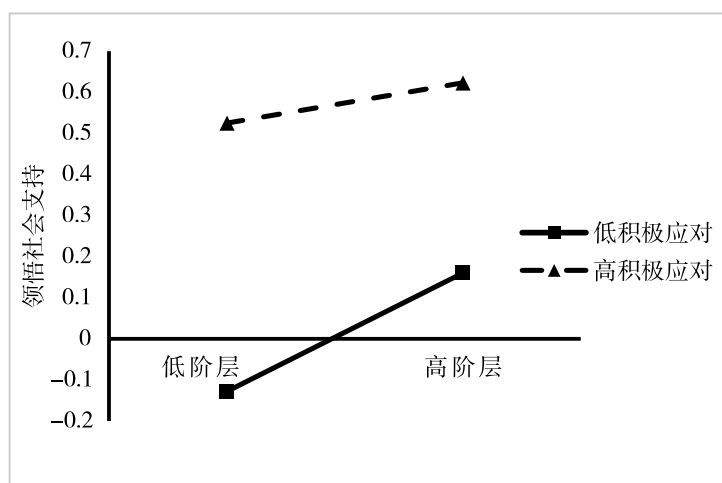


图 1 积极应对在主观社会阶层和领悟社会支持间的调节作用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4 讨论

4.1 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能显著正向预测人际信任,与已有研究一致^[10]。说明个体的社会阶层越高,对他人的信任水平也会越高,验证了资源因素理论。不同阶层的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数量存在差异,高阶层拥有更多的资源,比如教育机会、培训机会、实践机会较多,在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上更有优势,所以高阶层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越能面对与陌生人交往所带来的风险^[1, 11]。因此,社会阶层越高,人际信任水平也越高。

4.2 领悟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间的中介作用

在纳入领悟社会支持变量后，主观社会阶层不能直接预测人际信任，只能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完全中介作用来影响人际信任。首先，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越高，获得的领悟社会支持也越高，与已有研究相一致^[17, 27]。人际互动通常是一个社会资源相互交换的过程，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依赖于人际资源的多寡，与低阶层相比，高阶层掌握的资源较为丰富^[18]，“富在深山有远亲”也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支持。而个体感知到自己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对他人的信任度也越高^[19-21]，这可能是由于领悟社会支持高的个体容易感受到周围人的热情互助，从而更加信任他人；而领悟社会支持低的个体容易归因为周围的人自私冷漠，自我保护意识和戒备心增强，导致人际信任降低^[17]。

4.3 积极应对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积极应对在主观社会阶层和领悟社会支持之间起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已有研究结果不一致的现象。当个体的积极应对水平较低时，主观社会阶层越高，越能获得较高的社会支持，进而更加信任他人，支持了主观社会阶层正向预测人际信任的结论^[11]。这可能是因为积极应对较低的个体，在日常生活学习中主要依靠他人帮助，缺乏自己面对任务、解决任务的勇气，他们获得社会支持的过程较为被动。基于资源因素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低阶层缺少和他人交换的资源，难以发展社交关系，自然难以获得他人支持；而高阶层有更多的可支配资源，易于获得周围人的支持和帮助，容易形成他人对自己友善热情的印象，增加其对所处环境以及交往对象的信任，进而形成较为融洽的人际信任氛围。而当个体的积极应对水平较高时，主观社会阶层既无法直接预测人际信任，也无法通过领悟社会支持间接预测人际信任，支持了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不存在任何关系的结论^[14, 15]。高积极应对的个体善于寻求支持、适时改变自己的认知、积极发掘事物的美好一面^[28]，高阶层个体能够充分整合利用已有的他人的支持，低阶层个体在支持有限的情况下也能够积极寻找、获取他人支持，因此都能维持较高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主观社会阶层无法预测领悟社会支持。

本研究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分析了关于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关系的已有研究不一致的现象，发现领悟社会支持、积极应对等因素会影响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的关系。高校在培养学生人际信任的工作中，应注意考虑各因素的影响作用，扬长避短，引导大学生培养高积极应对的良好作风，主动寻求、利用各种支持，方能有效提升人际信任水平。

参考文献

- [1] 龚娇, 李伟强, 陈铭, 等. 社会阶层与信任之间的关系: 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J].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9, 7 (6): 346-357.
- [2] 王俊秀, 陈满琪.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2018)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3] 杨颖. 大学生自我和谐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 [J]. 高教学刊, 2020 (32): 65-68.
- [4] 赵静, 薛芳. 心理素质拓展训练对大一学生积极情绪和人际信任的影响研究 [J]. 科技创新导报, 2020, 18 (10): 224-226.

- [5] 张华.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心理健康教育之间的关系探究[J]. 西部素质教育, 2018, 4(15): 83-84.
- [6] 立唐. 大学生人际信任和孤独感的关系: 交往焦虑的中介作用[J]. 心理学进展, 2021, 11(3): 5.
- [7] 姜乾金.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1, 10(1): 41-43.
- [8]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et al.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12, 119(3): 546.
- [9] 江文路. 从控制型政府管理到回应型政府治理——重塑民众政治信任差序格局的改革探索[J]. 党政研究, 2020(2): 90-99.
- [10] Navarro-carrillo G, Valor-segura I, Moya M. Do you Trust Strangers, Close Acquaintances, and Members of Your Ingroup? Differences in Trust Based on Social Class in Spain[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8, 135(2): 585-597.
- [11] 郭永玉, 杨沈龙, 李静, 等. 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公平研究[J]. 心理科学进展, 2015, 23(8): 1299-1311.
- [12] 俞国良, 赵凤青. 社会转型: 国民信任感的社会心理学分析[J]. 河北学刊, 2017, 37(1): 148-154.
- [13] Piff P K, Stancato D M, Cte S, et al. Higher social class predicts increased unethical behavior[J].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2, 109(11): 4086-4091.
- [14] 杨沈龙, 郭永玉, 李静. 低社会阶层者是否更相信系统公正[J].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 [15] 曹怡骏, 姚振. 民众对律师信任度的实证调查[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9(2): 62-75.
- [16] Barrera M. Distinction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concepts, measures, and models[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86, 14(4): 413-445.
- [17] 谭雪晴. 高师贫困生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的特点及关系研究[J].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07, 7(5): 345.
- [18] 杨胜娟. 社会阶层、社会支持、社会态度、适应策略对男性犯罪行为的影响研究[D].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2009.
- [19] 叶宝娟, 杨雪, 雷希, 等. 网络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网络助人行为的影响机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 26(6): 164-166, 70.
- [20] 祝勇花. 精神病患者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相关性研究[J]. 护士进修杂志, 2012, 27(20): 1888-1890.
- [21] 郭娜. 社会支持与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J]. 河南社会科学, 2018, 26(6): 112-116.
- [22] 姜乾金, 黄丽, 卢抗生, 等. 心理应激: 应对的分类与心身健康[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3(4): 145-147, 90.
- [23] 胡荣, 姜小鹰, 张璇, 等. 老年冠心病病人的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相关性研究[J]. 国际护理学杂志, 2007, 26(3): 237-239.
- [24] Adler N E, Epel E S, Castellazzo G, et al.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 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J]. Health Psycholog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Division of Health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0, 19(6): 586-592.

- [25] 丁妩瑶, 彭凯平. 中译人际信任量表勘误及修订 [J]. 心理月刊, 2020 (6): 12-13, 5.
- [26] 解亚宁.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8 (2): 53-54.
- [27] 程永佳. 脱农离村群体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研究——基于社会流动角度的实证分析 [J]. 北京社会科学, 2013 (5): 108-115.
- [28] 吕长超, 樊毫军, 丁梦江, 等. 执行不同勤务的武警官兵应对方式与自尊、信任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J]. 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 2010, 5 (11): 1033-1034.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on Interpersonal Trust: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Yang Lei¹ Zhong Chanchan² Li Xuelian¹ Wu Shiyun¹ Shen Lujun¹

1. School of Psychology,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2. School of Science,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Abstract: Obje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subjective social stratum,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style. Method: A sample of 325 colleg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complete scales on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Results: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positively predicts interpersonal trust.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fu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Positive coping style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onclusi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 have impa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support.

Key words: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Interpersonal trust;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ositive coping style